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	唐少杰
【文革一幕】	成都四中官办红卫兵抄家纪实	雷 宣
【往事非烟】	1968年春我参与了北师大武斗	安希孟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

• 唐少杰 •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7月底8月初，“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不仅遏制并结束了大学里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而且给教育界注入了文革中后期的重要取向和基本特色。本文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个案，概述工宣队的某些特征。毫无疑问，在当时全国难以计数的工宣队中，没有哪一个像清华大学工宣队这样既有始作俑者的角色，又有辐射全局的作用，还有无出其右的典型影响。

一、工宣队的由来

工宣队源于清华大学文革两派群众的武斗。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由于两派组织“井冈山兵团”（以下简称团派）和“四一四”的论战与冲突，清华大学发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斗”。结束这一武斗，既不是上述两派，也不是清华名义上的上级主管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力所能及的，而是唯有毛泽东本人才能做到。

据迟群事后回忆，毛泽东1968年7月26日下午两点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身边的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指着地毯上铺着的清华地图，对与会人员进驻清华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63个单位参加的进驻清华大学动员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8341部队有关负责人等出席，部署次日进驻方案，这个大会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才结束。次日上午10点前后，来自北京61个企业、事业单位的3万多工人从除了北门之外的清华各个校门涌进清华园。

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他所派出的这些工人进驻清华（当时置身武斗的清华两派约有600余人）遭到了团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严重牺牲——5人死亡，731人受伤。不仅没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在事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举措，而且这3万多工人到达清华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泽东要平息清华武斗的决定。仅有工宣队极少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知道。正是由于不知道工宣队是毛泽东所派，这就不仅直接造成了严重牺牲，而且直接铸就了团派的政治灭亡。

毛泽东派出工宣队不告知清华人，成为至今都难以破解的谜。由于团派武力抵抗工宣队而造成了流血牺牲，更主要的是由于必须及时制止全国性的武斗，毛泽东把工宣队当成结束大学文革造反派群众运动的马前卒。工宣队的职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发表的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确。此文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所写，由毛本人做了多处修改并确定了题目。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发〔68〕135号文件）指出：整顿教“中央认为，育，时机到了。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到了9、10月份，工宣队进驻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已成为全国普遍的部署。上海市在9月5日到12日，有31000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每所中学平均有50名工人。另还有5700余名退休产业工人与工宣队一起进入小学。

这里有一个插曲：毛泽东在7月28日凌晨召见蒯大富等“北京五大领袖”的谈话中毫不关注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伤亡情况，并在召见结束之际叮嘱不要整蒯大富。这表明毛泽东至少到1970年11月在北京大规模进行“清查五一六”之前都没有“审查”或“惩处”蒯大富的意思。然而，由于工宣队进驻清华所遭到的流血牺牲引起了工人人们的极大怨愤，为了安抚或慰问工人，毛泽东8月6日把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赠送给他的两箱芒果全部转送给工宣队，并在稍后引起了全国性的作为毛泽东崇拜现象衍生的“芒果崇拜”现象。毛泽东还于8月15日最后一次进行文革初期特有的大规模接见解放军副团职以上干部时，接见了工宣队代表，《人民日报》等媒体特别醒目地报道了这则消息。

《人民日报》自1968年8月5日起，以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两周年之名，连续半个多月，连篇累牍地发表不点名批判以清华团派及其领导人为代表的“多中心论”的文章和报道，并于8月16日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已不打算再利用文革造反派，尤其是激进的造反派学生。

应该指出的是，工宣队与文革初始进驻清华的工作组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二者都来自清华之外的高层的“垂降”，给清华文革带来了“主宰”；不同的是工作组似乎姓“刘”（少奇），而工宣队似乎姓“毛”（泽东）。具体地说，工作组所沿袭的是文革前的中共政治运动路线，工宣队是在危机之际，它所实施的不只是扭转清华运动的趋势，还要展开文革中后期的一系列运动。进而，工宣队不同于1967年至1969年间在文革中广泛流行的处理或解决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所采取的军宣队方式和军管方式。虽然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有一定的工人成分，但是其领导却是来自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干部。这种打着工宣队的旗号来对清华的运动实施军人领导的做法乃是文革的一个独创。工宣队确立了毛泽东“亲兵”对于清华文革的直接占据，清华1968年7月底之后成为毛泽东独一无二的“文革要塞”。

二、工宣队的功能

工宣队进驻学校，有多重功能。从当时来看，是为了消除群众武斗，整合不同群众势力，恢复秩序，力图把文革转移到有序的阶段；从长远来看，则是为了取得学校的领导权力，整治广大教师和原有干部，监督和改造学校的教职人员，力图推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工宣队自进驻清华到1976年10月后消失，尽管其内部没有细致的职务划分和明确的干部级别，其自身的结构仿佛无形无序并很快“融入”清华之中，甚至没有什么正式建制，但是工宣队的领导人就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的领导人。率领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张荣温（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1969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1月，杨德中（中共中央警卫团政委）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从当时杨德中还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可以看出，

毛泽东实际上是派出自己身边的警卫干部主管清华、北大。至1970年初，清华大学约10名校级领导人中，只有刘冰一人（文革前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是清华原有的干部，其他人全部来自工宣队。工宣队是清华1968年8月至1976年10月的政治“总督”。

工宣队给清华大学的教育体制带来的变化，主要有以下3点：

首先，清华的主导力量既不是党委的政治领导，更不是革命委员会的业务领导，而是工宣队的全盘领导。表面上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但实际上工宣队的领导及其权威直接来自最高领袖。针对工宣队一些成员不安心在清华工作，想回到原单位工作，工宣队举办学习班，安定军心，有人谈体会：“我们撤了，敌人就来了。”在他们眼里，清华大学就是一块以教职员为主的“敌区”。工宣队领导人在1974年的总结中强调，他们顶住了排斥工人阶级领导的“歪风”“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中工人干部占二分之一以上”。实际上在清华校级的领导班子，工人干部的比例远不到二分之一。1968年后的清华各级领导班子甚至整个大学的领导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队代表（实际是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干部，工人微乎其微）、清华原有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的代表席位不“革命教师”是没有，就是无足轻重。1969年初成立的革委会只不过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1970年成立的党委会不过是抓阶级斗争、抓教职员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门。在恢复了清华的中共党的机构和领导之后，工宣队依然叠床架屋地行使着大权，造成了党组织中“党内有党”和“党外有党”的局面。

其次，此时的教育体制出现了以工宣队人员、学员、教师构成的“三结合”组织体制。工人是领导，学员是主体，教师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对象。工宣队把用推荐方式入学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以下简称学员），从对学员的培养和经历来看，工宣队是要把他们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业务标准放在首位。工宣队制造教师与学员的隔阂甚至对立，抬高并夸大学员的地位和作用，把作为受教育者的学员视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即受教育者要帮助教师改造世界观，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而形成中国文革中一大奇观。1970年春，试招的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上、管、改”的口号逐渐演变为所有大学的政治活动机制，用来在学员与教师之间划定明确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界限。学员们在入学之际和入学之后，都一再被告诫不是简单地上大学，而是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们争夺教育权，并要占领教育阵地。“工农兵上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掌握文权、巩固政权”。而教师“对待工农兵学员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最后，工宣队在全国率先提出“砸烂教研室（组）”，指责教研室（组）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它从组织上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分离、教员与学生分离、各门课程彼此之间分离”。具体做法就是解散基础课教研室（组），把教师编入学员班。教师的工作置于学员的班级之中，教员的一切教学计划、教学任务都由学员班级党支部来讨论、决定。

工宣队的所作所为大致上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一是不断进行“清查、清理运动”，二是整治教师和部分原有干部，三是搞“教育革命”。

从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976年10月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宣队以持续不断的清查和迫害来维系它的统治。整个文革期间，全校1228人被立案审查，17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58人非正常死亡。其中，由工宣队立案审查者达到1120人，约占教职工总人数20%；被专政者达到167人，1968年底至1970年非正常死亡（被逼自杀）的人数急剧增多，已逾20人，足见清查和迫害之惨烈。工宣队在清华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整治、迫害众多教师和干部的历史。他们通过大大小小10余次政治运动给清华广大教师和原有干部套上了一道又一道政治枷锁。工宣队一个负责人道出了他们的心声：什么“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更有甚者，

工宣队把广大教职员下放改造，加以惩治。1969年5月，工宣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外鲤鱼洲建立了试验农场。农场位于鄱阳湖畔，占地约1.1万亩。工宣队把这个还没有建成的农场吹嘘为“既是一个抗大式的劳动大学式的学校，又是一个既有工业，又有农业、商业，又有科学实验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里将成为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主要基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同时，在这里也改造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同年5月至10月，先后有5批约2821名教职员（约占教职员总人数的70%）先后来到这里劳动改造。这个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由于从事水中劳动，先后有上千名教职员患上血吸虫病。

工宣队把教师当成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经过1971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这种以教师为潜在敌人的做法得到了某种“证据”。所谓“两个估计”即：一、文革前17年教育界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二、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1970年秋季之后，许多清华教师愈益感受到“两个估计”如同两座大山压迫着自己。这种对于教师所采取的可用而不可信的政策，是赤裸裸的歧视加敌视，特别是对1949年到1966年学成就业的教师来说，不啻是巨大的失落甚至沦丧。一些人针对上述纪要，提出了批评。一时间，关于如何看待“两个估计”，成为清华斗争的焦点。工宣队一再强调，就是否定文化“否定两个估计，大革命”。他们的依据是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世界观不改造，能胜利呢？”这也就再次表明，文革把阶级的以及阶层的划分标准从过去的经济地位、家庭出身改变为现今的职业、知识直至世界观，这不能不说是阶级划分的一个独创；进而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使得文革由政治革命必然伴随着某种剜心剔骨式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革命。

工宣队自1969年初以来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受到了许多清华原有的干部和教师的斥责，他们借着1972年周恩来关于教育整顿的指示精神，试图恢复过去某些合理的教学方法和实行某些改革的工作措施，却再一次遭到了打击和迫害。1973年10月至12月，清华上上下下开展了一场名为“三个月运动”，旨在整治被称为体现“旧教育路线回潮”的一大批干部和教师。有64人被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403人被点名批判，被点名指责的或被迫做检查交代的人难以计数。所有这些人都被斥责为“就是进入一个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改造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毋庸置疑，进驻清华的工宣队在所有工宣队中充当着领头羊的角色。这不仅是由于这支队伍直接来自于毛泽东的授命，而且它是整个文革的后8年大学领域的“政治风向标”。其成员的平均学历大致不超过初中水平，绝大多数成员根本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他们在大学教育业务上不可与教师、干部同日而语。他们被套上了由毛主席派遣的政治光环，也就真正开创了文革时期大学领域“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工宣队模式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毛泽东由其早年的教育理念到文革乌托邦式的“教育革命”，成了清华大学的不幸，更是中国教育的不幸！

三、工宣队与“教育革命”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真正开始是在工宣队进驻清华之后。头两年群众运动无法使教育革命铺排开来，工宣队进驻为它的全盘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

工宣队不断强调，工人阶级“在一定意义上讲，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就是占领广大知识分子的群众”。

1970年7月22日，清华工宣队发表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以下简称《创办》），概述了“教育革命”的主要经验。这篇经过姚文元等人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文章可称得上“教育革命”的“范文”。以《创办》为标志，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方案首次以比较系统、具体的形式出现，它是后来被称为“教育革命的‘圣经’”的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某种雏形。在清华连续4年（1966年—1969年）没有招生并中断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创办》却“理论先行”，为大学办学画出了“蓝图”。

“教育革命”在清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独断。工宣队领导人多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今后，检查一个办学点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看这几条：工农兵管教育管得怎么样；教师、学生与工农兵结合做得怎么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上好阶级斗争主课做得怎么样”。迟群概括为：“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做斗争的先锋战士。”他曾强调说，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工宣队领导的“教育革命”具体表现在招生、师资、办学方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方面所进行的“革命”上。1970年3月，北大、清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提出招生方式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制根据各个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一、二、三年，另有学制为几个月的短训班；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战备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6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其精神和做法成为1970年至1976年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圭臬。

“教育革命”推行之际，师资力量只能“接收”过去学成的、现今在职的教师，尽管无法信任、依赖他们，但是这种“革命”根本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不可能撇开已有的师资力量而另起炉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政治上不可信的教师去从业务上培训学员。因而，“教育革命”的师资政策十分矛盾而又荒唐可笑。1970年招生后，教师们从事教学，却是动辄得咎，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有主导性和积极性。“教育革命”的斧钺不可能放松对广大教师的威慑。工宣队经常使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对付教师，并且有了“经验”之谈：“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发动了群众，就暴露了敌人；依靠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

工宣队所推行的“教育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对教育的仇视和对教育者的鄙视，如同当时清华工宣队一位领导人所说的：“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学生的夺权是一事无成的。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同理，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众多事实说明，如何对待“教育革命”意味着如何对待工宣队，因而“教育革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工宣队的成败。但是，的失败“教育革命”是必然的，其原因有二：

其一，“教育革命”是一场蒙昧而荒唐的“革命”。它是文革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为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教育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多数研究者大致归结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教育平均主义等等，而我认为这些都只是“教育革命”的特性，并不能涵盖其实质。“教育革命”的实质是蒙昧主义，的确是一场教育的大倒退，也是文明的大倒退。

其二，“教育革命”是反动而可耻的“革命”。“教育革命”取消文化考试标准而采取以政治标准招收学员的做法，从最初“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很快就在相当大的范围演变为仅仅由单位领导人决定“保送上大学”，实为“走后门”。据有关领导到有关的系、班级调

查，发现在不同系、班级学员总人数中“走后门”的学员比例约占12%，个别班级高达20%。这种现象也是全国性的。因而，“教育革命”的一个先天的、不可治愈的弊端就是它固有的封建特权的文化“基因”及其精神“遗传”。

“教育革命”是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实施和破产。它致使教育沉沦为政治的附庸，致使大学沦陷为文革的屠场，全盘地瓦解大学教育应有的取向和职责，阻滞人才成长、思想探索和学术创造，从“教育革命”理论的先天缺陷和谬误到其实践的后天变态，无不表明其充满着无法解决的异化和无法克服的自身异化。因此，本身就是反教育的。“教育革命”

四、工宣队的终结

工宣队最初进驻清华3万多人，到1968年8月下旬锐减到5140余人，70年代初保持在数百人，到1975年底至1976年10月，只剩70余人。自进驻起，工宣队就由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员构成，主要来自中共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一师、海军后勤部、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等单位的军人和北京市各机关和企业的干部、工人。军人依然保持着军籍，多年后一些军人还在清华就地转业任职。

从1970年起，清华工宣队的两个人物迅速崛起。作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的“钦定亲兵”，迟群（中共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宣传科原副科长）、谢静宜（毛泽东的速记员、机要员）不仅给清华文革而且给整个文革都带来了非同小可的影响。谢静宜还参加了审查林彪事件及林立衡的工作；另外，他们直接领导写作班子即“梁效”。

特别是迟群，给文革带来了两个独特的“贡献”：一是1968年春夏，毛泽东派出其身边的警卫部队干部进驻北京的“六厂二校”，直接指导这些单位的“斗、批、改”，以便把它们的工作经验推向全国。作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迟群执笔撰写的新华社内部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好评，认为是“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批发全国。以此稿为标志，各地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迟群还在清华向来自全国难以计数的人们做过上百场介绍清华“斗、批、改”经验的报告。二是1971年春夏，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为4月15日至7月31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执笔撰写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经过张春桥、姚文元修订后，毛泽东8月13日审阅同意，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这个纪要的要害就是前面所述的“两个基本估计”。

作为文革教育领域著名的“两个基本估计”的推手，迟群成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乃至教育领域的一大干将。他当时年富力强，地位很快超出了他的工宣队同事，继杨德中、张荣温之后，于1972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工宣队一把手，成为毛泽东的清华“总监”。

谢静宜的最大政治资本在于她有着迟群等人所没有的直接可与毛泽东联系的优势。虽然谢本人的表达、组织能力远不及迟群，但是迟群和工宣队要主宰清华，就必须有谢静宜这样一位可及时传达并实施毛泽东旨意的通天人物。的确，这两位大约只有初中学历的军人，自1972年起对于清华文革的掌控，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来自毛泽东，所以被称为“毛主席的两个‘兵’”。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之后，谢静宜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作为清华第二号人物，谢静宜在校外的职位和权力，由于毛泽东的青睐和提携，很快超过了迟群。1975年初，四届人大召开之后，迟群梦寐以求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愿望落空，迟、谢的关系开始紧张而微妙。迟从骨子里瞧不起谢，但又离不开谢。有谢静宜充当自己的副手，迟群上可通达天庭，下可更

有效地驾驭那些清华原有干部势力。然而迟、谢关系的紧张，既为清华原有干部所不齿，更为工宣队中不是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几位军队干部和工业干部大加利用。

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两次写信给毛泽东的直接起因是，清华工宣队原负责人之一柳一安（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原干部）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宣队工作回来之后，迟群没有给柳安排工作。柳开始发起并联系惠、吕二人，准备联名上书毛泽东，反映迟群的问题。惠、吕二人充分意识到，写信给毛泽东本人，还必须有一个比他们“高一位”的清华主要负责干部来署名。经刘冰同意，他们4人达成联合署名的决定。4人写信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毛泽东派人来清华大学了解迟、谢的问题，进而最终把迟、谢从清华“搬走”。刘冰不是写信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只不过是排名在首，他同意并参与给毛泽东写信一事就表明他对迟、谢的极端不满。另3位干部则是“正统”意义上的工宣队干部（其中两位是军人），这3位对于迟、谢的“反抗”表明了清华工宣队作为毛泽东派驻清华的主导力量，也充满了政治的厮杀。

1975年11月3日下午3点，有53人出席的清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在第二教学楼二层会议室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会上说，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讨论刘冰等人两封信的问题实质。吴德并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正是由于刘冰等4人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他们同迟群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斥责。刘冰是在11月15日晚列席政治局会议时才第一次听到了由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对他们写信的批评。毛的上述批评第一次在清华全校公布是在1975年11月18日举行的万人有线广播大会上，由吴德传达的。上述11月3日的会议“故意”不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味深长。传达毛泽东批评的步骤表明，是为了批判邓小平，试图通过刘冰等人的反应来决定有关部署。

毛泽东批评刘冰等4人写信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清华大学一域一事，致使清华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处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迟群、谢静宜与中共中央上层协力配合，把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及“批邓斗争”引入了中央政治局。1976年3月26日，清华、北大10余人列席政治局会议，当面批斗、声讨邓小平本人，开创了中共历史上由基层人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面斗争中央领导人的先例。据不完全统计，自1975年底至1976年春夏，全国各地约有30多万人次来到清华从事“批邓”的“学习、取经”，还有1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和记者来观摩“批邓运动”及大字报。

自1975年11月起，迟、谢以及清华工宣队在文革最后的11个月里，大力巩固其地位，大力整合干部队伍，几乎把清华打造成了政治堡垒。他们绝没有意料到，他们的政治生命随着毛泽东生命的结束而很快结束，在“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还不到3个小时，迟、谢便束手就擒。如同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寿终正寝，迟、谢的政治死亡意味着清华工宣队步入黄泉。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

## 【文革一幕】

### 成都四中官办红卫兵抄家纪实

• 雷 宣 •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一些人来说那是“劳动人民盛大的节日”，欢喜莫名；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对我来说，两样参半。不上学了，不会被包德超老师在黑板上写，全班男生考试成绩是2分（罪过，由此他被我们背地里喊成“包鸭儿”），

轻松了许多；忧的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口号已经响彻神州大地，我非黑五类莫属。

老爸一天回来，找我和姐姐谈话，说是被划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到现在也没闹清楚，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对当权派的称呼，老爸不是官员），要我们有被冲击的思想准备，如果他真是上述人员，要我们一定跟他划清界限。姐姐听了泪流满面，我则呆如木鸡，从此之后惶惶如丧家之犬。每日待在家里不敢出门，只是看见报纸上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宋彬彬为他带红袖章的照片等信息。大舅悄悄用北京街头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告诉外公，北京开始抄家，还打死许多人的消息。晓得已进入狗崽子行列，与啥子红袖章等无缘，无可奈何，等着挨刀吧。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文所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也就是当官的。可是文革一开始，首当其冲的却是民主人士、各界名流，接下来就是各种有“历史问题”的人员。这也难怪，文革开始时，毛泽东有意到杭州，留下刘少奇主持运动。刘请示，得到可派工作组，也可不派工作组等等模棱两可的说法，因此刘邓走的是五七年反右的老路子，既是文化革命，在知识分子中，包括学生，抓一批右派出来，不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按惯例向各院校派出工作组，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等根正苗红的官办组织，还抛出若干“黑帮”为替罪羊，另外加上若干知识分子来批斗，想把火端到别人头上（把祸水引向他人）。殊不知毛泽东是冲他们而来，两月后毛泽东回京，认为“运动”冷冷清清，偏离了方向，首先批判了派出工作组的做法是压制“革命小将”；然后从8.18开始接见红卫兵，制造了血腥恐怖的“红八月”。以后再把这些事，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部归罪于刘邓。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都被迫在会上承认“错误”，作了检查。

成都当然如法炮制，8.18后各校在“文革领导小组”等根正苗红的官办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红卫兵，各单位成立赤卫队。这些组织，在文革中被称为“御用官办组织”。记得官办红卫兵有自己的番号，四中叫8204部队，9中叫7468和3879两个编号（九中仅有的两部电话的号码），13中叫8213等等，仿效部队番号，用其作为红卫兵组织的名称。04、13我清楚，那是学校番号，啥子是82？想了很久才明白，挨到一起写，和毛体的“红”类似。

四中官办红卫兵成立始于“七五事件”，李井泉亲自布置，两次在家中召见了四中学生若干人等（一说是一次，有幸觐见的人员也有几种说法）。7月5日，三届教改班的申在望同学等人按李之授意贴大字报批牛耕工作组，说右派学生围攻左派学生云云。牛就此被查，李派心腹省委付秘书长贾丕绩任新工作组长，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挥四中“运动”。8.18前后，四中官办红卫兵在“文革领导小组”的学生成员的架构上成立。因此可以说，是从四中开始，拉开了成都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成都的官办红卫兵用来干什么？一般人都以为，运动初期官办红卫兵的种种恶行是群众组织的无序行为。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种种恶行都是在当局的策划和指挥下进行。记得一九六七年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四川省政协干部但汉然（90年代曾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在东胜街贴出的大字报中，基本上把成都抄家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大字报一经贴出，成都市被抄家的家庭悄悄奔走相告，不少人还去观看。我也陪妈妈去看过，过近50年了，我还大致记得内容。

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夫人郑英，文革开始前夕准备出国访问，在北京进行出国前培训。文革



开始后未能成行，但是滞留北京一段时间，目睹了北京“红八月”的种种情况。一九六六年八月末，西南局、省市领导的诸位领导处境已经大不爽，高校的“造反派”已经开始静坐西南局和省委，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咋个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解除火烧屁股的燃眉之急。李井泉召集成都市的领导，含市委宣传部、统战部、省政协的领导开会。会上介绍了郑英带回来的“北京经验”，决定使用官办红卫兵开始抄家。

会上市委宣传部长肖菊人认为这不合宪法规定，说了几句微弱的不赞成意见，旋即被否决。会议对如何控制指挥进行了分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雷汉统和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和运输公司联系，安排几个汽车队提供车辆搬运查抄物资；为保证参与者的加班伙食，联系糕点厂提供糕点（这就是以后“保皇狗”吃麻饼的典故来源）……一切都安排得细致入微、计划周密。

1966年9月9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锦江大礼堂开动员会，动员开展伟大的运动。参加者都是出身纯正的官办红卫兵，由省委领导动员。会后由省政协秘书长提供了一份名单，按政协副主席、常委、委员的名字排列，加上住址信息（这是事实，抄家后我在过道的烂纸中，发现了一张抄家者遗失的省政协稿签纸，应该是上述名单的第一页）。可以肯定，按此名单由各学校官办红卫兵分工，各负其责，包干有序。分工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只是从第一批抄家的执行者判断，抄我家是四中红卫兵，抄彭迪先家是九中。究竟要抄好多家，“一度部署（布置）：抄家要当成运动“中心”，成都市要达到人口户数的百分之四至五。”（《文革中成都的“破四旧”运动》，作者：郑光路）

9月10日上午9时许，我正在抱着一大摞“Time”杂志研究，咋个伦敦空袭时有绘意大利军徽的双翼战斗机参加。门铃声大作，跑去开门，门前两路纵队，20人左右，按高矮次序排列，女生在前，男生在后。装束基本为旧的绿军装，也有一些没有配齐一套，上衣为军装，裤子是平常的市民版。但是，“56”式制式腰带和以后的人造革腰带必备。腰带紧紧束着腰肢，戴着红袖套，可谓“飒爽英姿”，面色严肃冷峻。

看得出，三届教改班的申在望同学为头目，一声威严的齐步走，队伍开进院子大门。我呆立门侧，心里想这一天终于来了，说吓得双腿“筛糠”（发抖）不至于，甚至出于“登徒子”的本性，还有带头一排张姓女同学（姐姐实验小学的同学，也是四中初67级的同学），她！“二筒”（乳房，成都俚语）真大，比其余“板鸭”（平胸，成都俚语）安逸的一闪念。一声断喝：滚进切！我悻悻然进了二门。来的同学都是四中官办红卫兵成员，各年级都有。

同学们进得门来，集合当时在家的家人，外公外婆、两个表妹、我，姐姐当时不在，父母和姨妈在上班，守门的杂工和老保姆是劳动人民，不在排队听训话的行列。老保姆还算灵醒（机灵），小妹妹被她抱到羊市街的一家亲戚那里避祸。

申同学模仿政法部门的腔调，先进行验明正身的“程序”。

问：谁是刘星垣？

答：我是。

问：是大地主？

答：解放前是。

斥责：未必现在你就不是？

问：和刘文彩是不是亲戚？

答：不是，我是湖北籍，他是大邑籍，不是一家人，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对全体听训人交待“政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刘星垣，解放前为川西大地主，残酷剥削欺压农民。今天红卫兵 8 2 0 4 部队对你家进行查抄，如有其他和美蒋特务勾结的设备及变天账，还有反动书籍文字资料，趁早主动交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查抄过程中，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否则格杀勿论！”

家人先在过厅里排成一行，低头无语，大约两小时后，外婆和外公体力难以支持，我冒险拖过来两把竹椅，让他们坐下。各位同学正忙于研究欣赏抄出的各式新奇玩意儿，也没干涉。

9 月的天气还很热，为难那些没有体力劳动经历的官办红卫兵了。家里的东西之多，是原来大公馆里剩下的东西的总和，尤其是在 1 0 号院子的那几间房子，大大的房间内，和图书馆一样，一排排的高书柜，中间过道约半米，里面各种书籍装得满满的，房间上面有一层楼，虽不能住人，家具、字画箱、稀奇古怪的东西堆积如山；各个房间里也有许多大柜子，装老式钟表、老式相机、古墨……；甚至还有当买办时没有卖完的洋纸，大约有 5 0 0 公斤以上，一大堆。要把这些全部翻一次，即使野蛮操作，也是体力活。官办红卫兵个个汗流浹背，几个人抬一件也是气喘吁吁，不久就来不起（累瘫了）了。申同学决定，先不往外搬，等基本查抄清楚，找到反动证据后再统一搬回红照壁总部。时至下午，我们再在外面列队等候发落也不是事，阻挡人家操作，所以全部关进一件小房子听候发落。

抄家中发生的事，以抄出的东西分类及其由此产生的后果来描述，似乎更有理路一些。

#### ◇ 和所谓“政治”有关的

拐杖刀和弹簧钢鞭：家里有若干拐杖，广藤的、剑门关的剑杖，其中一根“斯的克”拉出来就是一柄细长的剑，和刘文彩公馆里哪把相似，还稍微长一些。按介绍，刘文彩的是残害贫农，威逼糟蹋妇女的凶器。我家这把是外公回国后，一心想在杂谷脑河上修建一座小水电站，曾经多次踏勘，为路上防身而准备，解放后路不拾遗了，自然束之高阁。弹簧钢鞭的用途类似。

大比例西南地区地图：一卷地图，装在一个圆筒型牛皮图囊里，用途也是为水电站，比例极大，是在英国伯明翰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时买的，年代久远。中印边界反击战时曾经翻出来，外公和我根据战报，仔细标注，感叹共军之神勇。所以我对达旺、得让宗等共军攻占的地方有印象。同班的好朋友李同学（第一天没有来，是第二天才来看热闹的），以后给我班的同学吹牛时说过，“老暴”家的哪卷地图中涉及中印南线的一张有重要参考价值，涉及中印边界分界问题，所以抄家后和一批重要物资空运北京。

以后我研究过这问题，先认为这是神侃，我家哪里会有那么重要的东西。坊间和网上说：对中印边界马克马洪线有重要证据价值的，应该是北京抄家发现的那张，宣武区“丞相胡同”某家的，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再深入研究，认为这不是神侃，完全可能是事实。

1 9 1 3 年 1 0 月至 1 9 1 4 年 7 月，英国、中国和中国西藏地方三方代表在英属印度西姆拉开会，讨论西藏的地位问题。会议期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利诱中国西藏地方噶厦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将边界从阿萨姆平原边缘向中国西藏方向推移 1 5 0 公里，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西起中国不丹边界，东至伊索拉希山口，长约 1 7 0 0 公里，将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 9 万平方公里国土划入英属印度。

英印政府对划界一事秘而不宣，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中央政府并不知道，达赖喇嘛

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线不予承认。对于这条“边界线”，历届中国政府都不予承认。英国政府也迟迟未敢公布，直到1936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才开始出现在英属印度的地图上。1913年才有谈判的事，1936年才正式标注，和清政府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磁电机：一个老式的汽车磁电机，这是外公在电机系毕业时的设计。谈不上啥子先进，只是得益于英国工业制造技术的精良，发蓝的钢外壳，绕得很规则的绕组，很精巧的整流子和电刷，是一件充满工业艺术的工艺品。住在同一条巷子的高六六级同学张某假老练（冒充内行），说是这玩意儿就是特务电台的手摇发电机（确实和电影里的二战美军的野战电台的手摇发电机有点像，但是此公忘了，那是野战电台，我们这些“特务分子”在大城市里用得着吗？），把我拉出去审问，摇手藏在啥子地方，电台又在哪里？……为了搜寻电台，同学们架起梯子，开始上房揭瓦，看看是否在天花板上有电台；院子里的花盆也全部打翻，寻找可能藏在花盆底下的“密电码”，自然一个个弄了个灰头土脸。

六分仪：航海、地质踏勘时定经纬度的，装在一个精美的木盒里。同学们研究了一会儿，看见上面有一个瞄准镜一样的东西，下面还带半圆的刻度盘。成都地区，阴天居多，基本用不成。张同学故作水深（不懂装懂）状，说是此乃迫击炮的瞄准镜，既然有镜，必然有炮，又把我拉出去审问，炮在啥子地方？我说：这是六分仪，定经纬度的，还找出附加的星表手册，示范使用，勉强过关。

老杂工的住房：老杂工的住房在大门边，相当于门房。屋内和狗窝无别，渔网一样的被子（记得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唱词：“一床破被像渔网”，老杂工和那差不多），烂成柳柳（条状，成都俚语）的蚊帐，衣衫褴褛。一点不夸张，叫花子模样。只不过个中原因是，他是送外公到上海出国的老家人的儿子，他爹在返回途中在重庆得了霍乱，死在重庆。家里花钱把灵柩抬回成都安葬，儿子就继续在我家当杂工。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为他在东珠市买了一个小院和全套家具，结了婆娘。这婆娘每月来一次，拿老头工资，顺带把所有稍好一点的東西席卷而去。每年十二次，每次我家为他添置的东西都拿走，你说咋办？

小口径步枪：家里有一只英国产的气枪，式样奇特，和那时常见的向下弯折枪管上膛的方式不一样，枪筒下有和枪筒平行的杆子，向下搬上膛。口径比国产气枪大一些，通用铅弹不得行，需要自己制作；家里不许我拿着到处切招摇，惹得公安局理抹（清查），油封后收藏。这枪被发现引起一阵愤怒的吼叫，地主分子竟然私藏小口径步枪！又把我拉出去审问。赶紧示范枪支使用方法，化险为夷。

美人杯：六十年代，刘氏地主庄园大热，传说刘文彩喝酒的杯子，装上酒就会出现一个裸体美人。坊间好事的半截子么爸儿（未成年的半大男孩，成都俚语）个个啧啧称奇，都想一睹为快。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晓得，那个东西家里“大大的”有，是产于日本，后来国内也有仿制，价格低廉的地摊货。原理很简单，平底瓷酒杯下面贴一张照片，上面加上一个半球型的磨砂玻璃。平时看不见图片，倒上酒自然就看见了，只是没有啥子希望看见裸体女人，就是一些挠首弄姿东洋女人头像。怕被发现，1964年我把大约20个这种杯子，藏在最隐秘的角落，不想还是被发现了。弄巧成拙，就摆在桌子上，你不说谁知道？于最隐秘的地方发现，当然得交代清楚。不过隐去“美人杯”的称呼，也没有过分为难。

伪币：大量说不上，有一大纸盒。各种面额，各种银行发行的。这是我的玩物之一，运动开始时该烧掉，但是不晓得咋个没有烧。这一大盒，也许连一个锅魁都买不到，这个时候就成了妄想蒋政权复辟的铁证。

拐杖刀和弹簧钢鞭、老杂工的住房等“罪恶”，激起了官办红卫兵怒火冲天的阶级仇恨，几个人冲上来把外公拖到后面的院子开始殴打。为啥要拖到后面院子施暴，也许是不愿意我们看见谁下手吧？当然，也许不是，未必还怕我报复不成？人这动物确实复杂，内心如何想的猜不透。

施暴者没有想到，后面的墙上有一个隔壁人家的“牛肋巴”（木条）通气窗，几个小孩子正站在桌子上看稀奇。几年以后他们给我说，带头下手的就是和他们住一个市委家属大院的张某，其余的人他们认不到。四五个人围着外公一顿皮带乱抽（没有用有铜头的那边就万幸了，有被抓进红照壁礼堂，皮带头子陷进头部而死的冤魂），打得遍体鳞伤。我们在前院，只听得到皮带抽到皮肉上的钝响，施暴者的呐喊。外公没有呻吟，外院的家人没有哭叫，有的只是沉默。半小时许，外公才走到前院，坐在竹椅上，背已经不敢挨着椅子背了。不敢验伤，待我们被关进小房子后才悄悄地解开衣服看伤情，鞭痕累累，惨不忍睹。1947年6月1日，外公为掩护地下党，被国民党省特委会的特务枪击，打断左上臂，丢进将军衙门27天，20年后又再次罹难，无语……

“抄家时成都打死19人，这是官方不完全统计数字，实际远不止此数。”（《文革中成都的“破四旧”运动》，作者：郑光路）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任何人承认自己参与过这件事吗？直到北京“大兴县事件”，325人被红卫兵杀害后，国际舆论大哗，认为恶行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纳粹，“红色恐怖”才稍收敛。

#### ◇ 和文化有关的

书籍：“孔夫子搬家——书（输）多”，这句歇后语适合我家。家里的书，抄家后卖成废书，得款1500元，废书5分钱1斤，算一算就该晓得是好多了。一部分是英语原版精装书，一部分是中文小说，一部分是“Time”“国家地理”杂志。内容千奇百怪，有进步的，《静静的顿河》《铁流》等；也有反动的，居然还有《我的奋斗》中文版（写的书名叫《我底奋斗》，文革前看过这种反动书籍的，四中可能只有我了）。当时担心的就是，万一发现此类书籍，一定死无葬身之地。所幸书籍太多，只是粗糙地将书籍扒拉于地下，来不及仔细翻阅。

字画：有三个大的樟木箱，里面全是画卷，很奇怪的是那么多画，家里却一幅不挂。每年夏天，参与把箱子抬出来，将画卷摊在太阳下暴晒，然后加樟脑丸防蛀，是我的任务之一。不懂中国画，自己画水彩和油画，所以也没兴趣打开观赏。肯定有张大千先生的，张抗战时期在成都逗留过一段时间，也进行过多次作品展览和出售活动。外公购得一幅“青绿山水”，曾悬挂于公馆的客厅。解放后，因为大千先生“逃亡”到台湾，为了不惹麻烦，家里不再悬挂他的画作。看见箱子被抬出，外公强撑着走上去：“报告小将，里面有一套石涛的四画屏，很珍贵，请妥为保管。”，“？你指一哈是那一幅画。”，四个画轴翻出来，一耳屎掺起来，“狗日的到现在还不忘宣传封资修哈！”，马上投入他们点燃的火堆化为灰烬。在展开、撕碎的那一刻，我看见了画的尺寸，10年前湖南发现了一套，尺寸小得多，媒体称为“国宝”。

古砚台：家里有古砚台40—50方，隔一段时候外公换一次书案上的砚台，视为珍宝。有几方也许确实珍贵，政协在文革前曾组织过各家收藏展览，曾经全部借出。故宫博物院也派人来借过，说是要举办砚台的展览。我记得的有两方：一方有九个“石眼”的端砚（罕见，现在有三个就是了不起的珍品了）；一方“金星砚”，尺寸很大，放上水，砚台里就会出现点点闪烁的小点。我有兴趣为外公洗砚台，所以很清楚的记得。至于有没有那样珍贵，我不研究砚台，不敢妄下断语。奇怪的是这些砚台，被同学们仔细包裹，然后搬走。随后听同班的好朋友李同学吹牛，说是和其他物资一并空运北京。如果真有此事，为啥子就不用再说了。

鼻烟壶：外公有大约40个鼻烟壶，他有吸鼻烟的嗜好。谁知道哪里来的鼻烟，据说很珍贵，我不是好懂，有兴趣度娘“鼻烟”即可。我也吸，感冒初起时自己倒上一点，吸进鼻孔，连打几个喷嚏，醒脑提神，驱秽避疫，这些鼻烟瓶，材质不同，有翡翠的，寿山石的，玛瑙的……。其中有两个玛瑙的最珍贵，上面有一幅天然形成的“喜鹊闹梅图”，看起来以为是内画，其实是大自然的神工鬼斧。原来有一个，后来一想，一个料子剖开可能还有镜像的那一个。许多年后，居然找到了那一半，成为外公的心爱之物。平时，鼻烟壶就放在两个紫檀木的壁柜里，挂在他卧室的墙上，抄家时全部没收。

瓷器：家里最多的是瓷器，没有确切数目，没有啥子稀奇。我书桌上有一只貌不惊人的碗，原来是一个装饰，淘气的我在里面装满了报纸折的“弹绷子”米米，大人给我打了一个招呼：“小心点！别碰烂哈，那可是宋碗。”看见瓷器被抬出，外公不顾刚被掺一耳屎，又多嘴：“那个紫色的花瓶请千万小心，那是国宝，交给国家可已换许多外汇的。”“？哪个？”外公提出瓶子，小心翼翼的交到某同学手里。同学手提瓶颈，故意放在外公眼前，铁棍一挥，一声脆响，化为碎片。外公一声惨叫，哪个叫声时隔四十余年后仍在我耳中，那是痛入骨髓的惨叫！抄家过去若干年了，外公还时时不忘，说是那个瓶子至少可以换10000美元啊！

难怪，这是一个窑变的瓶子。烧造瓷器，凡在开窑后发现不是预期的形状或釉色，以至于传世瓷器有时发生特异的情况者，都可说是“窑变”。《稗史汇编》说：“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康熙郎窑红、豇豆红、苹果绿等品种就是，但是一个变为紫色，和菜市上卖的茄子一个颜色的确实罕见。2004年，在中国嘉德推出的“飞鸿阁藏瓷”单色釉专题拍卖中，一件清乾隆窑变釉莲蓬口瓶获价165万元，是该专题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一件。2005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一件高17.4厘米的清雍正窑变釉贴浮雕螭龙尊估价150万至200万港元，成交价达258.4万港元，是目前窑变釉瓷器中的最高价。2006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一件清雍正窑变釉三牺瓶拍得224.8万港元的高价……

因为罕见，外公爱之如命，所以在成都解放时把一个窑变达摩立像交了，都舍不得交这个瓶子。

古墨：家里有两大抽屉墨，大小不一，形状不一。有些彩绘，金碧辉煌；有一些则有大量裂口，貌不惊人。我曾经干了一回荒唐事，小学学书法，街上的啥子“松滋侯”常常弄得书包臭不可闻。一想，家里那么多，何不用家里的。外公说，自己去拿一锭，金碧辉煌的不敢拿，就拿了一锭最丑陋的。课堂上一磨，满室麝兰之香。用了一段时间，得意洋洋的给外公说：“那东西安逸（说到安逸，说几句题外话。家教严格，这个用语在我家曾经被认为是粗口，说了会挨打的。直到小学3年級的语文课里“小兔子安逸的躺在兔妈妈怀里……”等语出现，才正式成为可用语言。哪像我现在，粗口连篇），好香哦！”，“？你拿的啥子墨？”摸出来一看，外公大惊失色，原来那是一锭宋墨。宋墨的特征就是香料使用龙涎香、麝香，安能不香？所有古墨，全部抄没。

玉器：外婆娘家在清朝时于西玉龙街开了一个玉器店，凡是货品中品相好的就收藏起来，还不断淘汰原来的收藏。解放后留下一包，应该是极品。其中有一枚拇指大的吊坠，通体碧绿，帝王级玻璃种。李同学给其他同学吹牛时说过，在成都抄家抄出的玉器中，“老暴”家的这枚最好。他们打来一盆清水，置吊坠于水中，竟然把一盆水映得绿莹莹的。姑妄听之，姑妄信之。所有玉器，全部抄没。

自行车：老爸的“来林”28圈男车，绿色、内三飞、轮芯刹，成都市就两架，另一架属于著名歌唱家郎毓秀的丈夫肖季（铁路医院院长）。那时的成都自行车都少，这两部车骑上街回

头率很高，不亚于现在开“本特利”上街的回头率。老妈的“红手”26圈女车也是一架好车。父母已经被冲击，老爸进了“牛棚”，车子不敢再骑到学校招摇，放于家中，抄家时全部抄没。抄家后，我和姐姐被勒令到校接受监督、劳改，我在四中化学实验室的外廊上看见了这两部车，居然还没有上锁。一番思想斗争，好想把我家的车骑回去；转念一想，那可使得不得，任何地方被发现，我就是个死！最终，恐惧压倒了“贪婪”。

古钟表、老相机、望远镜、显微镜……就不再一一描述了，反正这些东西被抄出后，同学们都觉得稀奇，一把玩。我当时有一闪念，同学们虽然是人上人，应该见过些世面，咋个还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样子哦？其他的“阿堵”物，我记不得了。也不用写，太俗。还有两样东西被抄出来，虽然没有引起同学的注意，却动摇了我原来受教育后对地主阶级罪恶的刻板看法。这是两块木刻印板，一枚刻：“庚鼎药房，见票施药叁服，刘府。”；一枚刻：“XX米店，见票施米壹升，刘府”，木刻版的四周边上，还有繁复的花纹，此外还有一些印好的票。

为了这东西困惑，所以专门询问了外婆。外婆说这是家里在成都市遇到瘟疫，诸如1920年的霍乱大流行等时候家里在门口施药使用的工具。民国时期的成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成都的人口就已超过30万。抗战时期，随着大量军政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的迁入和大批难民的涌入，成都的城市人口激增。由于当时公共卫生条件的不健全和当时市民现代卫生常识的缺乏，加上成都独特的地理环境，成都每年都有传染病流行。每到此时，成都各大户人家都在门口摆出桌子，用这种办法为无钱看病的人施以援手。因为公馆旁边就是庚鼎药房，所以药票上就是该药店的名字。月底，药店用票和家里结账。

米票的作用类似。抗战前夕，四川自1936年夏到1937年夏发生较大旱灾，武胜安岳一带灾民大量涌入成都；1945年7月和1947年7月成都大水灾，成都灾民达到19万。在这个时候，成都各大户人家都要如此善行。

我很疑惑，地主不是搞“半夜鸡叫”的角色得嘛？外婆说每到这个时候，成都市的大户都这样做，要是谁家不这样，会被人鄙视，从此就不要在“穿城九里三”这个地面上混了。加之家里老一辈笃信佛教，不这样做是不可想象的。至于领票的人会不会哄抢，答案是不会。那时的人担心天谴，这种善物不会多取，害怕报应；加之家家都有，天天都有，也没那必要。听完之后，种种固定的思维，开始有所动摇。

抄家第一天的晚上，留守的同学要我翻出几个100瓦的灯泡，装在过道和敞厅，把院子照得雪亮，免得我们趁黑夜把“胜利果实”拣回去；也网开一面，说是可以让我们去煮饭。于是，饿了两顿的我们煮了一大锅干饭，就着泡菜匆匆裹腹。干渴了一天，滴水未进，赶紧烧开水“牛饮”。事毕，又被关入小屋。除了两个妹妹以外，其他人通宵未眠，而且无语。

第二天上午，同学们大队再次“光临”。调来若干货车，排列在大街上，等候装运。近百米的巷子，两边密密麻麻排列看热闹的人，还按指挥左右排成若干行，中间留出通道。同学们亲自动手，开始装车搬运，个个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每抬出一批东西，都迎来围观者的阵阵欢呼（和法国大革命时观看断头机砍贵族的脑壳的观众何其相似），院子里听得到欢呼的声浪。借上厕所的机会，通过敞开的大门向外看了一眼，吓破了胆！同学们的军歌不是有一句：“……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时我的脚开始“筛糠”了。

这里还要说的是，查抄和珅、查抄荣国府都还有官吏登记造册，成都的抄家却没有任何登记，一股脑搬到红照壁。上海、北京等地抄家，还有登记，以后“落实政策”时尚有据可查，成都完全没有登记，相当于大水灾“洗白”。

第二天黄昏，“革命行动”已经完成，发给两张同学们写的大幅罪状，说是自己张贴到大门口，不得有丝毫损坏，否则格杀勿论。第一件事，和外公一起，在余热未尽的火堆上搅了一锅浆糊，用厚的纸张把这东西裱糊起来，再用两根木条上下装订。每天，外公掌梯子我上墙，高高悬挂，下雨、深夜再收回，免得损坏，招来杀身之祸。

回顾家里，除了满地铺床的稻草、丢弃的书籍、砸烂的瓷片，啥子都没有了。

第三天上午，外公收拾被洗劫一空的保险柜时，发现里面的暗柜居然没有被发现。英国原产的保险柜，在下面一格的底板上，有一方精细加工的板子，做工和底板一模一样，盖上后和底板天衣无缝。里面装的是为全家遭遇兵灾和改朝换代的大灾时保命的家底，除了他和外婆知道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里面有若干金条、钻石、铂金制品等物。外公把这些东西用手巾包好，提着到红照壁，交给来抄家的同学们。为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伟大政策，容许我们在堆积如山的衣服山中选一部份。如山一样的衣服，哪里还找得到自己的，只好胡乱根据家里人需要选了一些，才使家人有了最起码的换洗衣服。（那时候就是有钱，哪里找布票去买衣服）。到了文革后期，曾经问过外公，要是不交，也许我们现在就不至于这样贫困。他说你懂啥，这个时代保住家人的性命为第一要务。那些东西咋个卖？就是金条，只要在银行一兑现，马上汇报上去，那时就是一个死。

苦难并未结束，四中的贵族红卫兵抄家完了，接着就是13中的准贵族红卫兵抄，再轮到啥子黄瓦街民办中学的，一共抄了十三次，直到连锅碗瓢盆都没有，饭都没法子煮。家里原来的杂工被同学们遣返回家，现在开始发难。她的婆娘解放后终日游手好闲，金戒子、项链带起，靠老公的工钱度日，老杂工的表面处境由她一手造成。闻讯我家被抄，觉得发财的机会到了，想借机捞一把。一天，我在红楼下面，看见这婆娘拉着衣衫褴褛的杂工到处询问，晓得大祸将降临我和姐姐的头上。他们找到抄家的同学们，控诉老公解放后在我家的“非人待遇”，结果得到授权，再次洗劫我家。老杂工的发难，导致了进一步的惨剧。

父母一心想儿女成材，从上小学开始就强制为我和姐姐制定了必须考取四中的目标。父亲对我还说了狠话，考不起就去拉“架架车”，强迫我将中考的3个志愿全部填成四中。除了希望我们由四中开始踏入清华、北大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攀比。财大的教师中，不少人的儿女多是四中学生，刘成生、温厚一、刘灿等等。儿女双双都是四中学生，在财大是一件很体面的事。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把儿女投入了“火坑”。

当时的四中，干部子弟已经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就我们班上说，干部子弟占绝大多数，加上工人子弟和一些职员子弟，每班还有一个资格的农民子弟，说得上知识分子子弟的，就是我和陈维中两人。因为外公乃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解放前是大地主的身份尽人皆知（我至今未明白的是，为啥子学友们都清楚），我的身份最为可疑，忝列末座。姐姐班上（初67.2）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一进四中，“阶级斗争”的弦就绷得紧紧的。同班同学出身好的，经常训诫我“出身不由自己选择，道路可以由自己选择”，明确无误地提醒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我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迅跑，带着出身的“原罪”。玩耍过程中，发生摩擦，对方会破口而出，“狗日的民主党！”；按照脸谱化的描述，地主的狗崽子肯定嗜财如命，编一个四中工厂门口有散落的金片故事，想看我不顾一切前去搜寻的丑态……。所有争端，都由我的认输而告终。

城里的家被抄后，我和姐姐被勒令每日到校，接受监督改造。我任务就是每天到学生宿舍，为同学们倒夜里屙满的痰盂。为了使我更难堪，还故意把痰盂屙得“浦秋闷弦”；然后到校园除草。不时，还会模仿审判室的样子，在教室中间摆上一把椅子，他们坐在上端，要我坐在下面

交待罪恶。没有可交待的，这种把戏也有点笑人，所以都是草草收兵，就是一场和游戏差别不大的闹剧而已。

经历这些闹剧的心理状态还是比较稳定，首先习惯了垫底的身份，抱着“骂是风吹过，打是铁实货”的底线，只要不搁在身上，那就是“死皮”一个；其次，“心有旁骛”，有意想到那些和现实毫不相干的事情，就好过得多。记得，一次“审问”中，我想的是T-34-76坦克和T-34-85坦克炮塔外形的差异，完全没听审问者说啥子。当然，也许搁在身上了，会当“志高”“连举”（叛徒）吧。

一天，我在红楼下面的过道中，迎面碰见了我家的杂工陈大爷两口子，正在四处询问红卫兵的办公室在何处，晓得大祸将临。

第二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躲在学校大门外的角落里，等姐姐出来一起回家。时间已经超过了平时应该的时候，还不见姐姐的身影。想到近日子里各班级发生的召开“滚蛋会”（来源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娘的蛋！”这首歌），排出对象继而殴打“黑五类”同学的事件，意识到姐姐可能出事了，于是悄悄地从教学大楼靠邮电管理局一侧的楼梯爬上二楼，想看看出了啥子事情。

初67.2班的教室门斜对楼梯，只要教室门打开，在楼梯上就可以看见教室里的部分情况。估计殴打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姐姐说过，开始是用皮带抽打后背、臀部、大腿），从教室门口看见，几个男女正扭住姐姐，用一把剪刀较头发。前额的头发被一缕缕拉起来较去，干这事的男女似乎十分快意，可以听得到愉快的笑声，另外就是：“雷XX（一个极其侮辱人的词语），你服不服？”的询问。

头发较了，几个男女意犹未尽，要姐姐在教室一端手扶墙壁，躬身向后。他们则排成一队，从教室的另一端起跑，飞身踹向姐姐背部、臀部。快意的笑声阵阵……。姐姐没有哭叫，也没有呻吟，也许就是这个沉默的态度，未能满足施暴者盼望的快意，导致整个过程一再延续。

看见姐姐落难，我极其恐惧。有一点很清醒，我帮不了她。要是冲进去，只能使虐待升级，会被双双殴毙。被发现在远处窥视，结果也不美妙。所以又悄悄地回到学校大门的角落，蜷缩一团，浑身瑟瑟发抖，祈祷上天还能给姐姐留条命。

过了一会儿，看见参与施暴的几个男女有说有笑地穿过红楼的走廊向大门了，走来，连忙将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更紧地蜷缩成一团。待几个男女在石室巷拐角处消失，才急忙向红楼走去。未到红楼，姐姐迎面出来。额头上的头发被较得参差不齐，背后的衣服上脚印累累……

扶着姐姐，勉强从小路出城墙缺口到城边街，让姐姐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歇。姐姐要我给她理一理头发，尽量遮盖前额被较去的部分，她已经没有抬手自己梳理的能力了。我试图为她拍掉背后的污迹，但是手一挨到背部，她钻心的痛，只能作罢。

40多年过去了，已经想不全我们是怎样挣扎着回到财大的家的，只记得一些片段。青羊宫到苏坡桥有一路公车，就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来回运行。走到青羊宫汽车站前，汽车刚刚发车，只能等候，况且姐姐也走不动了。在旁边的烧鸭子店，央告服务员借了一根板凳让她坐下；等车不是办法，况且即使车来了，她没有挤上车的能力。我扶着姐姐慢慢向财大走，先头她还有走一两百米的能力，然后我就躬下，让她趴着我的后背歇一歇再走。后来，能撑持的距离越来越短，到了光华村，几乎就是几步一歇。途中，试图背过她几次，但是我背不动……



回到财大，天已经黑静，父母正焦急的在窗口上观望。看见他们曾引以为傲的一对宝贝儿女以近乎蠕动地向家里靠近，妈妈连忙冲下楼来接我们（爸爸因为冲击，勒令出门必须带好纸糊的高帽和悬挂黑牌，不敢轻易出门），两人将她左右搀扶上楼。进了家门，她根本就不能坐，背部和臀部一接触沙发、椅子就巨痛，只能躺在床上。最不堪的是，所有人不敢大声哭，唯恐大声哭叫会招来对抗运动的罪名，导致另一场惨剧，只有妈妈泪流满面……

妈妈找出“云南白药”，把瓶口“保险子”用一点白酒化了，喂她服下。我和妈妈一起把她扶到财大卫生所看病，结果用财大卫生所的病情证明来说好些，“背部、腰部、臀部、大腿外侧广泛软组织挫伤、淤青；肾挫伤，肉眼可视血尿”。事情过去近半个世纪了，老母亲还记得她看见的伤情。姐姐的整个背部、臀部、大腿后部和两侧，全部是青紫色的瘀伤，只有那根淡黄色细皮带掩蔽的部位还是正常的颜色。诊治的医生流下了眼泪，说是打得太狠了，再继续打，那就会因为疼痛性休克而毙命。当天晚上，爸妈一直守着姐姐，唯恐出现不测。想得到，那天晚上姐姐一定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是，她没有呻吟，也没有流泪……

财大卫生所条件有限，按医生嘱咐，第二天借了一辆自行车将姐姐推到省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是省医院的外科主任黄文，黄主任的结论和财大卫生所基本一样，再次开具了病情证明。这张证明妈妈收藏了若干年，最后还是散失在以后的动乱中。

第三天，姐姐班上来了5个男女，说是“雷XX”对抗运动，装死躺下，要继续揪回学校斗争。妈妈赶紧拿出病情证明，加之姐姐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几个才悻悻然离去。待姐姐稍好，一张车票把她送到北京小姑妈处避祸，以后又到西安小姨妈那里，算是躲过一劫。

同时间段里，四中几乎每个班都发生过官办红卫兵痛殴“黑五类”同窗的事件。我班虽然谈不上“痛殴”，但是已经被整成“黑帮”的干部子弟，处境还不如我。机械厅厅长沈兰芝之女沈小兰，一个“沈特务”的外号，让她每日以泪洗面；刘兆丰和谢若英之女刘力南，据说还挨了打。详情不知道，也不敢打听。亲戚中，初66.1班刘敏林，初66.2班韩小钰，和姐姐遭遇相似，程度好一些而已。

前几年和一中、九中的朋友聊天，谈到四中学生斗学生的惨剧，几个朋友都说他们学校这样的情况远没有我校这样残酷和血腥，其中原因大家都明白。“中朝无缙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我们不背时，该谁背时？“国家有罪，你们有恶！”，就是历史的真相！

我能理解，也能宽容，同学们的“革命行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受蛊惑利用，本不是各位的错。就好像我被某人用木棒痛殴，不至于对木棒本身耿耿于怀，应该对手持木棍的人心存敌意才是正理。但是一些同学以后的所为，却和受蛊惑利用毫不相关。

住一个巷子的张某，除了抄家时作恶，每到外公发工资的10号就带起红箍箍来我家，勒令外公交出工资，稍有迟疑就拳脚相向。甚至为维持生活新购置的闹钟、锅碗等都被此公席卷而去。直到1967年4月，这时他爹被当街批斗，在他又一次抢人的时候街坊邻居看不下去，呵斥、围堵，此公才作罢。

1967年10月间，官办红卫兵已经沦为过街老鼠，几个官办红卫兵的成员（进屋的是9中的），还敢在月黑风高夜翻墙进入我家，目的很明确，要钱！邻居被惊动，认为是进了贼，大家围堵，情急之中，他们摸出红袖套证明乃红卫兵是也。一追问，却说是“红卫兵指挥部”的？“纸火铺”（指挥部的贬称）的“保皇狗”得嘛，几个抱头鼠窜。虽然带起大口罩，我还是认出了他们是谁。

一些官办红卫兵在抄家中间顺了不少贵重物品，发了抄家财。当然，查无实据，也没人承认。运动后期，人保组曾经理抹过其中一些人，部分东西被迫交出，用金条换来的钱买来的照相机也被收缴。

抄家在文革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被抄家的家庭比比皆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罚没抄检”的历史记录。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文史精华》2008年第1期，作者：丁大华）

成都市的抄家谈不上谁是第一家，六个政协副主席是第一批，几乎同时落难。四中学友中和我家同时落难的至少还应该有一人，政协副主席童少生的女儿。她家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文革后期的“落实政策”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人格侮辱。第一次规定在发还抄家物质时，货币、贵金属、文物均不在发还之列；无法发还原物的手表按5元一只，大衣10元一件、衣物5元一件……折价。没有任何清册，随意堆放、散失，哪里找得到原物？加上物资已经在发还前由当时革委会、警备司令部的大小头脑选取，按上述标准付钱畅意“选购”，最后我家就是得到人民币680元。第二次，发还文物，只有很少部分说不上文物的瓷器，还用报纸糊住瓷器的关键部位让大家辨认，免得被冒领，所以就是走过场。抄家是“革命行动”，系咎由自取；发还是“皇恩浩荡”，我等还得山呼万岁。

我家房屋“被志愿”上缴房管局，安排进了四家人居住。幸喜院内的一个独立小院相对独立，还可为外公、外婆保留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直到去世。

1966年11月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进展，我家情况稍有好转。造反派群众组织迅速膨胀，成为多数派。“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有的是从老红卫兵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其中的工农子弟，或原来是军干、革干、后来突然变成了叛徒、特务、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家庭的子女。一部分是运动初期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或小工商业者的子弟。还有一些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一向胆小文静的女生，甚至还有一批是运动初期的‘狗崽子’们，父母自杀、被关被斗、被报纸点名的‘从里到外’都黑透了的‘黑五类’。他们有的还成为一些组织中很活跃，很有实力的骨干。”（胡发云《红鲁艺》，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我这“狗崽子”，居然有了参加运动和群众组织的资格。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不再为当“狗崽子”而受到迫害、歧视所恐惧，所以很快乐。至于快乐未能持续很久，随着父母被反复的弄成“516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我又陷入迫害、歧视，那是后话。

不但我们这些小毛毛虫快乐，就是德高望重的大师也一样。“北京大学的季羨林教授将这段时期称为他的‘快活半年’，不但免于被批斗，而且混迹于群众之中，到解放军高级干部家去参与抄家。他和其他一些教授后来又参加了群众组织‘井冈山’，敢于向聂元梓叫板。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都积极参加运动，一般中间群众更无所顾忌了。”（杜钧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另一面”2011—03—1）文化大革命由此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季羨林的“快活半年”里，被他参与抄家的解放军高级干部就未必快活。同样，我快乐了，同学们未必快乐。由此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许多造反派领导人，一旦占据优势，掌握权力，就违背了造反初衷，也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政治迫害。而且模仿官办红卫兵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西南局、省市县的干部纷纷落马，鲜有例外者。四中官办红卫兵中的许多人，父母落难，抄家、批斗都在他们身上重演，其惨痛之状远远超出了我家。我家家破人未亡，而不少同学则家破人亡，父母被整死，一些死法和死状还惨不忍睹。

申在望同学养母申妈妈在成都市被逼迫得跳楼自杀，我围观，怎一个惨字了得；以后一段时间，申同学和申妈妈同居一个破烂的小屋，和我家在同一巷子里。冬季的一天，好像是为居委会发“号号票”吗还是啥子，我上过门。破旧的小屋里，“湖上寒风呼呼响，舱外雪花白茫茫”。申同学和申妈妈为御寒，一人披一床铺盖蜷缩在床上，其状况催人泪下。之后，听说申同学母亲肖里在当局所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省革委、50军的昭觉寺学习班）中自杀身亡，兄弟在北航因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被殴打致死，心里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觉，只是阵阵恐怖。即使是“手把文书口称敕”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一旦龙颜不悦，顷刻之间就会沦为和我一样的“狗崽子”身份（当然是暂时的，和我永远的有区别）。

这种“黑色幽默”虽然浩劫之中常见，却是过于血腥和残酷。所以，同班李同学给我道歉时我要他不要说了，“同是天涯沦落人”，道啥子歉？他没有加害我，严格说他也没错，境况比我还凄惨，还是朋友和玩伴，难兄难弟吧。

要写出这段经历，必然涉及当事人物。但是，目的不是在五十年后对同学“口诛笔伐”，也不必用自己的一孔陋见来强迫别人接受一种观念。记录史实，由大家去评判，由后人去思考。

耳顺之年，对过去的事当抱着“往事如烟”的心态来对待，或者用流行的词语“向前看”。可是，从薄熙来在重庆主政，“唱红打黑”甚嚣尘上时，渐渐感到了背上的阵阵凉意，完全和1966年上半年的感受一样，一种巨大的恐怖慢慢笼罩了我。虽然薄的一记耳光，使形势逆转，但是谁能保证我们以后会不会遇到其他的啥子“熙来”、“东来”、“北来”、“南来”？文革的死神没有走远，官办红卫兵也就不远处。说不定哪一天，门铃大作，进来新形式的官办红卫兵，让你享用升级版的“待遇”，毒药、暗杀……出于恐惧，想给后代留一点真实的历史；加之我家乃成都被四中官办红卫兵抄家第一批，我又是四中学生，我不写这段历史，也许永远不会有人提及。于是，有了上文。

## 后记

有同学在看了我的文章后给我联系，为参与对我姐姐施暴表示歉意，我想对这些同学说：

我相信，四十多年来你们良心上一直有负担，因为你们有良知良能，人性并未泯灭。扪心自问，假如自己也是革命干部子女，运动初期一定不会落在你们后面。这不是某些个人的错误，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愚昧与荒诞。

“往事并不如烟”。一切个人的是非恩怨应该放下，但是对于文革历史的质疑和探究却不该停止。

文革初期，“红五类”学生斗“黑五类”学生不是偶然发生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远的不说，从1963年以后毛泽东提倡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其副

产品，已经把我们根据家庭出身被分为三六九等，作为被人事部门和招生、招工单位内部掌控，甚至贯彻于班干部的产生，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事实已经很清楚，“红色恐怖”其实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制造出来的，他曾批评阻止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试图采取措施制止武斗中打死人的建议，故意制造了社会治安的真空。同时“中央文革首长们”到处讲话对革命小将表示“支持”，让小将们头脑膨胀。一大批“成分不好”的平民百姓被推到毫无治安保护的状态，任那些一时被妖魔化了的青少年殴打和宰割。毛泽东在当时不是不了解情况和不知道后果，是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压倒政敌，不惜抛弃千万无辜的生命。

我们都被蒙蔽、利用和抛弃了！一些先被发动利用，然后被抛弃整肃；另一些先被排斥整肃，然后又被发动利用。到最后几乎人人被骗，个个受害。而且最不堪回首的是，还因此放大并利用了我們身上的顽劣残暴，扭曲泯灭了我们的人性，这给我们造成了终身的创伤和悔恨。

文革说到底是一场成人之间的斗争，为何要把我们这些孩子搅进去？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株连平民呢？这是一个没有宪政、没有法治的社会之必然，不会在乎我们是不是孩子。人民生命与尊严在权力争夺面前不会有任何人顾忌。而且这种争夺还你死我活，充满暴力和血腥。我们必须为牢固地建立起了宪政与法治制度而努力，在没有建立这样的制度前，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将随时存在。

所以要尽自己的努力，哪怕这种努力极其微弱。还是那句话：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 原载《共识网》

~~~~~

【往事非烟】

1968年春我参与了北师大武斗

• 安希孟 •

1966年冬天，朔风凛冽，我们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显然是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奉旨伐罪（“近者奉旨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就擒。”）持有上方宝剑。那里面还有刘邓的照片，是可忍孰不可忍！刘邓一上台，那可是千百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不是闹着玩儿的。表面上轰跑了工作组，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做自己思想的主人，把握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是受命于天，被牵线木偶。我们每晚被大车拉到国家经委占领三里河木樨地（没胆气上华尔长安街），在人家宽大办公室沙发软椅楼道里静坐躺卧。犯困时打盹，小腿转筋，嗷嗷直叫，也没怨言。我真的弗知此行的目的何在，不知此举关乎最上层政治斗争结局。大学生文明，不吵不闹，也不砸不抢。“上面”头头们应该同国家经委头头有联系，要求陶鲁笏“站出来”或曰“滚出来？有一天晚上，忽然人影散乱，脚步匆匆，中央首长来会议室接见了，穿着军大衣的是戚本禹。余秋里陶鲁笏显然不如戚公神气！戚与余训斥了陶公！陶公的主要罪状是慢待革命群众，让我们受冻了。北师大后来派串连小分队去大庆造反，可能是为了肃清“刘”毒”吧。真不知哪来的这股傻劲！一根筋！

1967夏日炎炎似火烧，首都百万大军日日游行，揪刘火线发誓揪出刘少奇，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特洛伊木马。不过我们打心眼里并不真的仇视刘少奇（我和他没冤仇，再说，搞资本主义对我也没害处）。相信比我们更激进更贴近上层的人们未必真的对刘邓陶切齿痛恨，

又没有杀父之仇呀。许多人很大程度是觉着政治游戏好玩，较上层人物从中渔利得着好处。北师大的旗帜飘扬，在首都红卫兵中是翘楚，也使我们几分自豪。青年人的热情被绑架。1967年夏一次瓢泼大雨游行，揪刘火线遭遇“雨淋淋”浙沥沥。我身上出荨麻疹，冻得打哆嗦。北师大革委会谢天德部长接获新华门8341禁军兵弁通知，用摩托车把我“托”（拖）回。谢部长是我们那一代人中自觉自为的阶层，非吾曹阿斗辈稀里糊涂随大潮裹挟而下一日千里。1967年初北师大去武汉串连支左，在我们，是“目盲”“无的”，他却是知道谁敌谁友这个根本问题的。

北师大65级英一（1）班是唯一一个没有揪斗自己同学的班级。董连猛是系里关押批斗。我们和其他同学轮值看守批斗，但没有发言。我甚至违纪领她放风宽慰他，被清理出“看押组”。我们没有一次班会批判同学。有一次一位同学小字报揭发雷天生反动言行，但也没有张贴在外面。我们的会议是批评这位张贴小字报的同学。刘某说徐秀芬有攻击伟大毛的言论。我们没有人起哄。无人响应。王尔德回家替自己家庭成分“反攻倒算”。有人说他为反动家庭翻案。但石沉大河。分班后的小一班唯一批斗的朱其英，似乎不是同学起哄。那些老师比学生积极。我们谨慎地和他们保留距离。徐秀芬有一次说漏了嘴，说毛主席老了，牙齿掉了，嘴里漏风，怕人看见，用手捂住嘴。于是有人说他恶毒攻击，但没有掀起浊浪。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人有私心，就会把她拉出去枪毙。又有一次宿舍毛石膏像，头与身体剥离，我和刘来牛悄悄把尸首拿到楼外砸了。如果有一个犹太，我们就要上十架。这个班没有一个参加造反兵团的。就我个人的思想而言，当权者有个反对派，是社会福音。但平心而论造反兵团属于文革中省无联一类极端派。和巴黎公社共产国际一样，人类文明应该摈弃。我最近的巴黎公社文，属于嬉皮打闹三花脸。别人不知，我心知肚明。同道中人，会心一笑。哈哈。当然，文章偶有惊人语：点到了人民公社死穴。

文革他们还是少年，“幻雅”冲动。毕竟他们少不更事，且如今反省了，悔罪了，致歉了，负疚了，俯首了，鞠躬了，潜然了。不知反省，不知悔罪，不知致歉，不知负疚，不知俯首，不知鞠躬，不知潜然的有北师大革委会副主任二号人物活着的谭厚兰董连猛。他脸皮厚，他不但勇猛抑且疯狂指挥武斗初露军事才华打砸北师大工五楼，他亲自拉长强力弹弓的汽车轮胎弓弦，只识弯弓射大雕，断水断电让工五楼里炎黄贵胄龙的传人造反兵团肝肠寸断饥肠辘辘半夜鸡叫“星夜里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主席毛在中南海吃不下红烧肉，游泳无力量。当时工五楼玻璃窗弹痕累累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晚上更还看。糟饭兵团在工五楼掘地三尺挖井不忘吃水人。他们用桌椅板凳堵塞楼梯，逃过一劫，幸未被打死。后来兄弟院校给工五楼送去馒头榨菜一口炒面一口雪。他在批斗自己入党引路人杨芝岭老师时是急先锋。他紧跟工作组，抓学生右派走在前列，又是保守派伪红卫兵师筹委会团长。押解斗争彭帅按脑袋踢打，批斗彭真余秋里的是他。他造反无寸功却登上师大井冈山二号钻井台。他喜投机，从保皇派红卫兵师团级匪军官一下窜升到井冈二号成副师级战犯。他从不寂寞一刻不消停。1967年九七事件，他痛哭流涕表示上了林杰谭厚兰贼船如梦初醒发誓下船。他把英二年级吴正明（现为苏州特级教师）同学打成反革命，至今不知道这个反革命有什么反动言论。那个被他围攻武斗的造反兵团的罪状，原来不过是反对谢富治。反对某个副总理，就是反革命，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我们无力改变这个定理，但我们有理由不对同学同事同胞下狠手。他的诗集仍充满文革哀号悲鸣狂言谰语。那是反动诗集，大毒草，翻案文牒，煽惑文革情绪，发泄一腔怨忿，积蓄仇恨，怀念万古罪人毛豆哲学，应列为禁书。他仇视改革开放，对大锅汤时代饿殍遍野无任向往之至。他乘坐改革开放之舟游历亚非却梦想驶回浩劫岁月，他仇恨一切人，唯独对煽惑无知青年打砸却又牺牲他们无辜生命的匪首无比怀念。他是青青芳草绿地上的狗屎。

附言：我对于谭厚兰，二号人物董连猛（我们班的），没有特殊仇恨。只是看了女附中之事有感。谭（北师大头头）已死。可哀。不应该苛责。我多年的文章还是同情。但董连猛至今怀念流逝的岁月，仇恨对立面，不可思议，不可原宥。去年返校，初听他诉苦，我还表同情，后

来就觉着不对了。他也无辜，但整肃人向上攀爬，就不对。我们应该消除仇恨，但消除仇恨应该通过自我反思，当然不能无原则无操持。

2 0 1 4 — 4 — 1 9

☐ 原载《中评网》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